

平台经济下的劳动控制及其破解研究

王淑婷¹ 贾淑品²

(上海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平台经济下,数字劳动、数据垄断、算法控制共同推动劳动控制策略转变。从控制机制看,平台资本以“产消一体化”劳动方式实施生活控制、以平台算法推荐实施心理控制、以测评与监控劳工信息实施全过程控制、以劳动控制权转移实施隐秘控制,且分别表现出控制范围扩大、程度加深、广度延伸、方式隐秘的特征。平台资本以更加精准、隐秘的监控,让劳动者陷入数字成瘾、主体性消解、隐私丧失、虚假自主的困境中。有必要在厘清新型资本控制逻辑、明晰劳动者困境的基础上,反思新型控制策略的产生与运行,合理规制数字劳动中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促进平台经济的健康运行。

关键词:平台经济;劳动控制;资本逻辑;新变化

中图分类号:F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5)04-0119-10

DOI:10.19742/j.cnki.50-1164/C.250411

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平台日益成为社会生产、日常生活的主要场所,平台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快速崛起并不断发展壮大,使人们享受到便捷的数字化生活。但值得注意的是,资本借助平台经济在垄断数字技术和数据的基础上,以更加普遍且隐蔽的方式展开新型劳动控制,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解蔽资本对劳动控制的新推动,实现劳动解放已成为当下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重点。国外学者率先意识到数字技术变革带来的互联网平台下劳动控制的复杂性,并展开批判性分析^[1]。达拉斯·斯迈兹指出,媒体和广告利用各类方式对受众进行控制,以获得经济利益^{[2]22-51};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则认为资本通过非物质劳动实现对人们生活的全面控制^{[3]32};罗森布拉特具体分析了优步如何利用算法追踪司机的评分、接单次数、行程时长等数据,并以此对司机进行监控和评估,从而实现了对司机最大程度的控制和剥削^{[4]26}。国外学者竭力呈现资本对劳动的控制过程,同时他们认为当下劳动控制问题的复杂性已经超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亟待新的理论介入^[5]。与此相反,国内学者通常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仍然是批判劳动控制必不可少的工具,并从马克思劳动过程角度入手展开分析。有学者指出,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劳动控制方式从组织控制转向算法控制^[6];有学者以外卖骑手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平台如何利用算法对骑手展开时间控制^[7];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数字技术改变了劳动过程的各要素,劳动资料的数字化使资本对劳动的控制更加隐蔽^[8]。

综合来看,国外学者身处资本主义社会大环境之中,更早关注到数字劳动的产生和变化,理论较为

收稿日期:2025-04-28

作者简介:王淑婷,女,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贾淑品,女,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帝国主义本质研究”(23&ZD327)。

成熟,他们对劳动控制的病理性分析,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启示和思考。但是他们在批判时往往以资本主义为制度前提进行探讨,因此,我们在对平台经济下的劳动控制展开批判性分析时,一方面,在借鉴西方学界的相关理论成果的同时,要看到西方学界所暴露出的受到资本逻辑统摄的弊病;另一方面,要立足本土实际,坚持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角展开分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研究资本在平台经济下展开的劳动控制策略,为在中国数字平台发展过程中避免资本操控提供相应启示。

一、平台经济的兴起与劳动控制策略的转变

平台经济是通过整合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资源,降低不确定性、提高生产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涉及平台与企业之间、平台与用户之间、平台企业与用户之间的多重关系^[9]。平台经济不仅扩大“剥削”的广度和深度,而且将“剥削”彻底掩盖,以一种全新的策略牟取“剩余价值”。平台经济催生新的数字劳动类型,数据垄断和算法操控是平台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手段,此三方面共同促进平台经济下劳动控制策略的转变。

(一) 数字劳动:劳动控制策略转变的前提

平台经济的发展不仅变革了人类生存与社会联系的方式,而且创造了新的社会分层和数字劳动新类型。根据劳动过程的不同特点,可以将平台数字劳动划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平台传统雇佣劳动,劳动方式只需接触少量简单的数字化工具,是受平台经济影响最小的劳动类型;二是平台数字化专业技术劳动,这种劳动往往借助高端数字工具对软件和数据进行处理,且接触数字化信息和知识最多,对创新能力要求最高;三是平台“产消一体化”劳动,劳动主体一般是数字平台用户,用户在互联网中的在线活动会产生浏览痕迹,这些痕迹被平台收集并转化为生产数据商品的直接生产资料。四是平台零工劳动,此类劳动者以“自我雇佣”的形式进入劳动力市场,具备基础的数字处理能力和专业技术能力,能够自己决定工作的时间和地点,主要从事对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工作。

平台数字劳动所表现出的劳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推动劳动控制策略发生转变^[10]。平台传统雇佣劳动的劳动过程趋于标准化、简单化,工作环境和设备的控制已达到极限,控制劳动者的每一项劳动操作已不再必要,因此,必须寻求其他的控制策略。平台数字化专业技术劳动对专业性要求较高,平台资本所有者又很难熟知和掌握这些知识,因此,此类劳动者重新掌握了对自身劳动的控制权。为确保实现对劳动者的完全控制,同时防止传统的控制方式压抑劳动者的智力和创新性,平台资本所有者会转变劳动控制策略。平台产消一体化劳动者追求自由,对他们的控制不能采用传统科层化的硬性规则和程序,必须采取新的控制策略以吸引并保留现有劳动者。平台零工劳动者的工作场所呈现出固定性、分散性的特点,因此,对零工劳动者进行传统直接控制的难度较大、成本较高,这就要求平台资本所有者会寻求转变控制策略。

需要说明的是,数字劳动类型之间的划分并不绝对,上述几种劳动类型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劳动类型也会伴随数字技术和平台经济的发展而发生相互转化的情况,但是不管如何发展,劳动都会受到资本的控制,数字劳动类型的出现就是劳动控制策略新变化的前提。

(二) 数据垄断:劳动控制策略转变的基础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与劳动之间关系时指出,“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他的劳动属于资本家”^{[11]176}。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家实施监督和控制的手段不断变革,从依靠人来监督,到利用机器进行数字监控,再到利用由数据处理程序和算法软件构成的智能监控体系对工人进行监督和控制,都显示出资本控制手段的发展轨迹。数据和算法在资本逻辑驱使下,异化为数据垄断和算法操控,并成为资本进行劳动控制的重要手段。

资本控制劳动的第一步便是进行数据垄断。基于海量用户和网络效应,平台交互活动每时每刻都将产生大量数据,这些数据被平台收集后,经由算法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整理转化为数据商品,当数据商品被成功售卖,代表平台资本对利润的获取。随着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数据越来越成为平台企业的重要生产要素和核心竞争资源,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资本逐渐展开对数据的争夺、开发、攫取、垄断。

资本实施垄断的首个对象是数字劳动者进入数字平台时的初始数据,包括性别、年龄等基础信息,目的是为了对用户进行初步识别和分类。当数字劳动者开始劳动后,资本垄断的是数字劳动的累计数据,如外卖骑手和网约车的行动轨迹、订单数量、评价等级,以及用户的消费记录和社交数据等。此外,为了获取并垄断更多有效数据,平台不仅利用各类监控手段精准获取用户的隐私数据,而且将资本延伸到娱乐、购物、休闲等方方面面,扩大了数据垄断的范围。平台凭借技术优势实现数据垄断,使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相分离,在此基础上,资本开始实施对劳动的控制,即数据垄断是劳动控制变化的基础。

(三) 算法操控:劳动控制新策略的重要工具

算法是指运用各种数字符号、工具、步骤对数据进行分析、呈现和描述,并将复杂的世界加以规整描述的一种策略机制,其往往归属于计算机和信息技术领域。平台经济中,算法可以展开劳动控制源于其所具有的以下特征:一是决策精准性。平台资本将数据传输到其内嵌的算法中进行分析处理,精准完成任务分配、绩效考核、产品定位、销售策略等决定,降低了管理者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等不稳定因素。二是即时性。算法利用垄断数据实时分析数字劳动者的偏好、行为倾向、业绩表现等,又将获得的信息及时反馈到资本的具体决策之中。三是算法黑箱的普遍性。算法黑箱其实是算法输出前我们无法明晰的流程,因此,数字劳动者并不确知平台收集了哪些数据,更不知道数据被应用到哪些环节,他们只能单方面接受平台算法制定的规则,却不知规则从何而来^[12]。

算法原本是平台用来分析用户喜好、改善平台服务策略的工具,但资本为加强对数字劳动者的控制,将算法异化为操控型算法,控制平台体系内的每一个因素,从而实现利润的增值。

二、平台经济下新型劳动控制的内在机制与特征

在数字劳动、数据垄断和算法操控的基础上,资本控制劳动的机制发生转变,与其相对应,劳动控制的特征也发生了新变化。

(一) 平台经济下新型劳动控制的内在机制

新型劳动控制机制主要包括以“产消一体化”劳动方式实施生活控制、以平台算法推荐实施心理控制、以测评与监控劳工信息实施全过程控制、以劳动控制权转移实施隐秘控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为获取更多的利润,资本通常会多种控制策略和控制机制交叉使用,但是,总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控制方式与控制策略相配合,因此,对劳动控制机制的研究集中于每一类控制机制中的主要控制方式。

1. “产消一体化”劳动方式:实施生活控制

“产消一体化”劳动方式不仅将资本对劳动的控制扩展到整个社会,而且使劳动在生活过程中隶属于资本。在传统劳动过程中,生产时间和生活时间相互分离,生产时间是痛苦的死神时间,生活时间是享受的爱神时间^[13]。但在平台经济中,劳动与生活交织在一起,用户的每一次点击和浏览都是生产过程。此时,不仅劳动者的自由时间被纳入到利润产生过程中,劳动者在生活过程中的消费、个人发展、娱乐享受等活动都被纳入到资本增殖过程中,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被迫延长、劳动范围被迫扩大,为资本提供了新的更多、更深刻的隶属关系^[14]。

平台用户为维护互联网社交关系,将自己的情感、知识、思想等对象化到社交平台上,这一对象化过

程为平台创造了价值,原本属于生活过程的社交活动也成为劳动过程被纳入到生产领域。资本为最大限度获得劳动资源,利用各种有趣的、更新速度快的内容吸引用户停留在平台,使用户不能接受与数字平台的长时间分离,由此,用户与平台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不可分,生产消费者的生活过程也越来越受到资本的控制而转变为生产过程。事实上,数字化和科技化越是普遍,人类越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这种接触往往是以亲密关系和社交关系为基础的^[15]¹⁰³。但是,平台经济下人与人的交往更多地建立在数据之上,人的身体被禁锢在固定的场所,数字资本却营造出一种每个人都可以同全世界进行交流的感觉。资本为实现对劳动者的生活控制,将其限制在虚拟世界,扩大虚拟社交关系,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人与人之间关系被异化。

2. 平台算法推荐:实施心理控制

算法推荐技术对平台用户的在线活动数据以及社交数据进行收集、分析、处理,形成每个人不同的数字画像,掌握用户的潜在需求,并以此为依据进行精准推荐,推荐方式包括内容推荐、协同推荐和混合推荐等^[16]。在资本的操控下,算法推荐技术沦为资本控制劳动、加大利润获取的技术工具。此类控制机制主要应用于平台“产消一体化”劳动中。

为实现资本增殖的最大化,算法往往通过技术更新取悦平台用户,并通过持续不断的精准推送增加用户在线时长,加强用户对算法的依赖,使用户原本有限的注意力时间被越来越多地控制在平台之中,引导用户的行为和思考,诱导其生产更多数据。以“饭圈文化”为例,明星经纪公司利用算法精准定位粉丝群体,诱导粉丝的情感投入,利用算法推送增强粉丝对明星的情感投入,为明星制造更多的流量以提升资本价值^[17],此外,随着粉丝对明星的情感投入增多,粉丝越容易产生非理性购买昂贵的明星周边、集资援援等现象。可以看出,平台资本利用算法处心积虑地控制劳动者的心理,诱使数字劳动者以资本所期望的方式行事,使用户所有生命时间都变为资本所利用。

3. 测评与监控劳动者信息:实施全过程控制

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构建了一种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相结合的数字空间,这种数字空间具有“无处不在、无时不刻”的特性,可以利用算法对数字劳动者的每一环节的劳动过程进行精准的捕捉、追踪、分析,从而展开全过程的劳动控制。此种控制机制可适用于所有新型劳动类型中。

数字劳动者在平台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都被纳入到严格的控制系统中,从人员筛选、任务分配到订单数量、用户评价、薪酬标准等的全过程都受到资本的监督控制。例如在对数字化专业劳动人员进行招聘时,资本借助算法对简历进行筛选,依据简历信息建立求职者的数字形象,进而挑选与企业相契合且具有潜力和发展前途的员工。在员工进入到企业之后,会被强制安装监控类软件,以便平台对员工实施数据收集和全面掌控。对于“产消一体化”数字劳动者来说,平台通过后台监控,对其浏览、转发、消费等活动进行全面的控制,从而能够向其推送个性化的内容和广告^[18],这不仅可以提高广告销售的成功率,而且可以增加用户在平台的停留时间,无形中增加用户在平台的退出成本,从而增加用户对平台的依附性。

4. 劳动控制权转移:实施隐秘控制

在平台经济中,平台资本所有者利用互联网强大的痕迹保存和数据处理能力,对劳动者进行监控,并实施劳动控制权转移策略,实现隐秘控制^[19]。第一,平台资本所有者将劳动控制权转移到监控设备上。遍布各处的智能设备充当了监工的角色^[20],全程监控、定位劳动者的上下班打卡情况,使得劳动者受到资本的全程监视。第二,平台资本将监控权力转移给消费者,实现劳动控制权的再分配^[21]。平台利用优惠券奖励、积分兑换等方式引导消费者参与评价数字劳动者的劳动表现的评价中,并借助算法将消费者对劳动者的评价数据化,作为考核劳动者的业绩、声誉等的基础^[22]。这种消费者的评价监督系统在形式上抽离了平台对劳动者的控制,使劳动过程表现为劳动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不仅遮蔽了平台对劳动过程的控制,而且模糊和遮蔽了劳动对资本的从属性。第三,资本将控制权转移给劳

动者自身,促使劳动者实施自我控制。以短视频平台为例,平台向短视频内容创造者描绘出一幅跨越阶层、实现财富自由的“美好蓝图”,引诱劳动者积极地投入平台创作中,为平台赚取海量数据和规模用户。平台宣传核心内容创作者的收入,却刻意掩盖底层用户劳动者惨淡收入的现实,这实际上是平台将控制与规训隐藏在劳动者的自主性之下,促使劳动者形成自我控制的文化。在这种自我控制的逻辑之下,平台用户劳动者将压榨自我视为获得成就的唯一机会,这些看似主动劳动的背后都隐藏着资本的控制^[23]。资本将劳动控制权转移到劳动者自身,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资本在场控制的压迫感,劳动者和平台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也被掩盖在平台、劳动者、消费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之中。

(二) 平台经济下劳动控制的新型特征

平台经济中劳动控制的新特征主要表现为控制方式从生产领域扩大到生活领域,控制程度从外在强制转变为内心暗示,控制广度从单一监管延伸至全过程监控,控制方式从资本在场隐秘化为资本不在场。

1. 控制范围扩大:生产领域到生活领域

数字技术的发展使生产时间与生活时间界限模糊,生活领域被纳入到资本控制的领域,使得资本控制范围扩大^[24]。在传统工业时代,劳动者通常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和地点,资本主要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或提高劳动效率控制劳动者,此时,控制范围往往只局限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一旦离开工厂,资本对其监督控制就会中断。资本为了最大限度地控制劳动者,不仅窃取劳动者的吃饭和休息时间,而且采用轮班制的工作制度,扩大劳动控制的时间。

在平台经济中,资本利用数字化设备和智能监控方式对劳动进行全天候掌控,从而最大程度获取利润。“社会工厂”是资本扩大控制范围的显著表现。“社会工厂”一词由安东尼奥·奈格里提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渐打破地域的限制,工厂之外也可以进行价值创造,企业越来越变成“没有墙的工厂”和“没有工厂的公司”“当工作过程从工厂转移到了社会,也就启动了一个真正复杂的机器”^{[25]92}。也就是说生产和生活的界限被打破,社会工厂可以通过平台将劳动、信息、资源甚至是劳动者的才智输送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资本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控制劳动进而实现资本增殖的目的。数字劳动者劳动与休闲的界限模糊,甚至人们的休闲娱乐领域都变成成为数字平台资本所有者进行价值创造的场所,蒂兹纳·泰拉诺瓦将这种情况称之为“全天候电子血汗工厂”,将互联网在线用户称之为“网络奴隶”^[26]。

2. 控制程度加深:外在强制到内心暗示

在传统劳动中,资本为最大化提升劳动效率,通过精细分工、科层等级管理、机器程序设置等方式形成管理控制、制度控制、技术控制的一体化结构控制体系。这些控制方式都是外在于劳动者的,并且带有强制性。

在平台经济下,资本利用大数据和算法等手段操控劳动者的心理,使劳动者按照资本的期望从事劳动。一方面,资本利用算法操控,诱导劳动者增加劳动产品的产出,例如,通过平台算法的自我学习机制,可以将其收集到的数据整合分析后得出每个劳动者的数字画像,从而精准推送内容和广告,这就使用户原本有限的注意力时间被越来越多地控制在平台之上,引导用户生产更多数据。另一方面,平台资本将劳动定义为“玩乐”,潜移默化中将人们带到“玩劳动”中。以短视频平台为例,平台资本将用户在线活动定义为“娱乐”,将用户刷短视频定义为一种休闲娱乐方式。事实上这是平台资本用类似于“兴趣”“玩”之类的字眼掩盖平台用户的劳动过程,并宣称刷短视频是娱乐放松的一种表现,诱导用户加入“玩劳动”之中。用户往往对“玩”放松警惕,愿意加入“玩”的行列,从而陷入资本控制的陷阱,为资本生产更多数据。

3. 控制广度延伸:单一监管到全过程监控

全过程控制不仅可以对劳动实施全场景控制,且形成劳动控制闭环。工业经济的劳动过程主要在

物理空间中进行,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也在物理空间中实施。物理空间是物质性生产要素聚集而形成的空间,具有地理固定性的特点。资本所有者为了控制劳动,将劳动能力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将劳动者的劳动过程置于物理空间中进行监督管理。在物理空间中,技术空间与社会空间无法分离,很难形成闭环控制。此时的劳动控制往往是针对某一劳动过程、劳动方式、劳动时间的单一控制。

在平台经济中,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数字平台,利用算法收集无实物形态的数据并构造了平台虚拟空间,平台资本则将劳动过程扩张到虚拟空间中^[27],以展开对劳动的全过程闭环控制。虚拟空间由一系列数据信息和符号所构成,也是由技术空间和社会空间组成,但是与物理空间不同的是,虚拟空间中的技术空间和社会空间可以在表象上分离^[28],也就是说,劳动者与劳动者、平台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无需局限于同一物理空间中,资本可实现对经济生产活动从发生到结束的所有环节进行监督控制。

4. 控制方式隐秘:资本在场到资本不在场

资本不在场的控制更具柔性。传统工厂中,资本进行劳动控制多为身体监视、行为规训、奖惩体系等管理人员在场的外在控制。在资本的控制下,劳动者处于提心吊胆的状态,工人尽管表面服从,但内心十分抗拒,这种监工即资本的实际在场,往往会引发劳动者的强烈反抗,激化劳资矛盾。

但是在平台经济中,传统资本在场的直接控制进化为资本不在场的隐秘控制。平台资本利用算法对劳动的知识进行窃取、数字化编纂和分析,“将知识工作转变为工作知识”,在结合不同数字技术的基础上精确监控劳动者,以确保发挥劳动者的最大潜能和实现最大生产效率^[29]。这种转变升级为资本不在场的“责任自治”,通过发展平台劳动者的自主性实施隐形控制。此时,资本的劳动控制由台前转移到幕后,不仅提高了劳动效率,而且缓和了劳动者与平台资本所有者的冲突。

三、新型劳动控制引发的问题及其破解之道

平台经济下,劳动者不仅没有因为技术的进步而获得自由和解放,相反,其刚从严格监控的工厂中逃离出来,就又面临资本更加精准、隐秘的控制。在资本的全局控制之下,劳动者不仅存在数字成瘾、主体性消解现象,而且受到资本的全景监控而丧失隐私,深陷虚假自由之中。

(一) 新型劳动控制下的劳工困境

1. 劳动者存在数字成瘾现象

平台主要通过扩大用户群体、延长用户在线时间来扩大劳动控制范围,但随着获取平台新用户的成本增加,平台对用户的争夺从数量竞争改为存量竞争,将摇摆不定的临时用户吸纳为持续在线的数字劳工。这一操作确实强化了劳动控制,但也引发和加强了劳动者的数字成瘾问题。

数字成瘾是对互联网和在线平台的过度依赖、强迫和草率地使用^[30]。有数据显示,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 79.70%,较 2024 年 12 月增长 1 436 万人,人均每周上网时长为 30.6 个小时,较 2024 年 12 月提升 1.9 个小时^[31]。可以看出,互联网已经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社交通信、发表观点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当用户将其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互联网之中,不使用互联网就会心痒难耐,只想沉浸在网络世界而排斥现实世界,且孤立感愈发强烈,就会产生网瘾^[32]。数字成瘾后不仅精神萎靡,而且人际关系出现危机,使人陷入社交恐惧、焦虑和抑郁等症状。长期的数据成瘾还会导致情绪不稳定,例如在线时的轻松感与离线后的紧张与烦躁等^[33]。尽管当前的数字化生存不可避免,但合理引导数字产品的使用,避免数字成瘾是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2. 劳动者主体性不断消解

在平台控制之下,数字劳动者的日常生活和思维方式被算法牵引,接收的信息大部分来自算法推荐,日常生活和行动都依赖算法指令,这使得原本自由自主的活动在数字资本的支配下变成为资本生产

财富——数据,从而失去自主性。数字劳动者生产的海量数据为算法升级变革提供原料,算法使智能机器越来越像人,而人却越来越失去灵性,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34]49}。智能技术使人变成机器,并且这种状况呈现出升级态势。随着平台经济的井喷式爆发,人工智能的运作系统也越来越趋于无人化、自主化,而作为主体的人却失去主导地位成为参与者、旁观者,傻瓜技术和设备不断被发展出来,也同样使得人的身体机能、工作技能甚至社会技能面临系统性退化的风险,人的主体性越来越受到异己力量的控制和宰制。

3. 劳动者丧失隐私

平台对劳动的控制摆脱了传统固定劳动空间在时间、地点和管辖权上的限制,实现对劳动的“全景式监控”。从劳动过程开始之前的数字化决策,到劳动过程中对数据资源的协调管理,到剩余价值实现过程的智能供应链监视,再到产商与消费者之间的供需匹配,数字化监控技术蔓延至数字平台产品及服务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全过程^[35]。

智能算法利用劳动监控打破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隔阂,协助资本变本加厉的剥削、压迫数字劳动者。为了谋生,数字劳动者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将原本确证自身本质力量的劳动活动变成自己的谋生手段,甚至将自己的隐私数据出卖给平台资本所有者以获得数字化生存,此时,数字劳动者的身体和活动数据不仅被资本纳入到生产过程中,而且还被资本纳入到资本增殖逻辑之中。史蒂文·瓦拉斯和朱丽叶·朔尔认为全景式监控是“一个坚不可破的数字牢笼,这个数字牢笼对每一个数字劳动者都实施着密不透风的监控”^[36]。在全景式监控的劳动中,智能监控对数字劳动者的行为进行监控并形成海量数据,数字劳动者的所有劳动和隐私都受到资本的控制。

4. 劳动者深陷虚假自由

平台经济构建了一种迷惑性的劳动形式,让劳动者以为自己对工作和休闲时间具有自主支配权,能够自由自主地实现个人发展。但实质上,这种自由是受控的且有限的自由,平台经济下这种片面的自由实际上是一种“虚假自由”,与真正的自由背向而行。

平台经济下,劳动者的工作不再局限于固定的地点或固定的时间,并且可运用各种智能化手段展开自主的物质与精神生产活动,表现出劳动自由的假象。但是,智能监控下的生产模式不仅没有放松对劳动者的控制,反而扩大了资本控制范围,使劳动者处于资本控制之下,从而对劳动者形成更深层的劳动压迫^[31]。智能监控下,数字劳动者往往会因为无处不在的监控设备和算法监视而感到隐私遭遇侵犯,从而产生压力倍增、焦虑烦躁等心理负担,其结果是数字劳动者更加顺从资本的统治。这种隐形控制方式让数字劳动者时刻处于心惊胆战、惶恐不安的状态,基于此,平台资本所有者进一步限制数字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自主控制权,将数字劳动者从“机器的肉身形塑成可以发挥经济功能的工具性力量”^[37]。

(二) 新型劳动控制下的破解之道

平台经济下,平台资本所有者利用私有制将数据生产资料占为己有,并利用算法操控对劳动实施隐秘控制与剥削,使数字劳动者陷入困境,阻碍了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了破解平台经济下新型劳动控制引发的劳动者面临困境,必须辩证思考数字资本与劳动主体之间的关系,超越数字资本增殖逻辑,恢复人的主体意识,使数字劳动成为“令人满足和自由的主体性活动”^{[38]33}。

1. 解蔽数字资本对数字劳动的控制

揭露当下数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塑造的自由、繁华的假象,戳破资本控制剥削和控制的真相。数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给人们塑造了一个假象,即在数字技术带来的加速生产之下,人只有依赖数字技术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否则就会降格为无用之人。此外,当人们深陷数字化虚拟空间时,就会被资本所引诱而忽略自身的真实需求。实际上,这些虚幻的假象是数字资本主义借助数字技术掩盖其剥削和压迫

的结果,要想打破这种虚假场景,就需要社会主义国家发挥主要作用。首先,社会主义国家要以提升国家实力为目标,借助数字技术的创新性发展推动综合国力的提升,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相较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其次,要想让人们意识到数字资本主义对个人实施的隐形压迫和剥削,就要满足人们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个人在数字资本主义的虚幻假象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最后,要打破资本主义通过资本逻辑和技术逻辑联姻形成的全球垄断格局,建设数字时代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2. 促进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

必须让劳动者明晰数字劳动的性质和概念,认识到他们基于数字平台进行的活动并不是单纯休闲活动,也并不像看上去那么自由,意识到他们进行的数字活动发挥着构建数字资本主体性的中介作用,了解数字劳动的生产性及其建构意义,才能揭露数字空间中在线活动的自由假象,提高劳动者追求自由全面发展的意识,进而自觉地去发掘和拓展劳动对人的综合性意义。

推动主体意识的觉醒,还需要劳动者树立批判性思维,实现自我突破。批判性思维要求我们从正反两方面思考问题,从多角度、多层面对信息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其背后的逻辑、内涵、特性,从而提高我们的判断力、决策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我们在信息数量急剧增长的情况下,能够辩证地分析信息的真伪、价值和意义。

3. 超越控制生产和窥探生活的资本逻辑

解决数字劳动过程中的数字监视,确保用户的隐私安全,不能从单方面入手,需要从多角度入手进行协同合作。从社会层面看,要实现数字技术的技术理性向劳动工具理性的复归,发挥数字技术作为最新“机器”在降低劳动力雇佣、生产管理、过程监督成本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从国家层面看,预防数字劳动过程中的数字监视,避免数字资本无限扩张,需要明确数据权力,确保数字监视在数字劳动者知情同意下施行。第一,立法保护数字劳动者的数据所有权。数字劳动者往往是在强制性同意后,互联网公司不仅获得了获取数据的权力,而且获得了数据的所有权,这是数字资本进行数字监控的第一步,因此必须首先保护数字劳动者对其所产生数据的所有权。第二,立法完善数据信息访问权。目前,平台企业可以无限制地访问用户的账户信息,使用户无隐私可言,因此要立法保护用户的隐私,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是否开放自己的信息。第三,完善数据权利保障机制。发挥政府部门和各级工会组织的监督作用,防止企业随意挖掘和出售数据信息,包括规范买卖个人数据、第三方企业的数据等。

4. 破除劳动自主与劳动控制的逻辑悖论

要想破解平台资本对劳动者的劳动控制,实现劳动自主,必须打破资本的权力关系,规制数字技术对个体的控制,摆脱数字资本对个体交往的控制。首先,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防范资本的无序扩张或突破红线、底线、高压线,实现数字劳动健康发展。为此,就要以劳动者的权益为核心,防止平台资本的跨界垄断和无序扩张。其次,互联网平台应该开放治理和完善自身算法规则,将平台的收益与用户进行共享。每一项科技发现和发明,既是发明者本人的资产,也是社会和历史的产物,还是人类共同劳动的结晶。因此,平台的经营模式和盈利模式应该以人的真实需要为基础,确保劳动者的自由。最后,平台劳动者进行数字劳动自治。数字劳动者可以借助社交媒体,建立自己的社群团体网络,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平台的数字劳动者可以通过讨论日常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形成有一些有约束力的共识,对平台企业发起诉求。

四、结 语

就资本主义社会来说,生产力要素的变化看似使其进入到没有压迫和剥削的数字化信息社会,但是从生产关系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改变,其仍然是为了追求利润、创造更多剩余价值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科学和技术被应用于剥削工人以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39]201},智能化、数字化

的科技发展只是资本借以增殖和扩张的手段,是“承载不断演变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的新的支撑点”^{[40]6}。尽管平台经济孕育产生的共享经济和“数字公地”等超出了平台资本所有者的预料,但是这些新的经济生产方式的出现并没有改变资本控制劳动的局面,甚至为资本的进一步扩大提供了利润空间。

我们无法否认平台经济为社会带来的便利以及促进生产力提高、经济增长的作用,但也不能忽视其利用数据垄断和算法操控实施劳动控制以实现资本增殖的事实。在人与平台日益密不可分的时代,我们要批判的不是平台本身,而是平台背后的资本增殖逻辑。

[参 考 文 献]

- [1] 刘卓红,郭晓晴.资本增殖、劳动异化与算法权力——当代西方左翼对资本主义数字劳动批判的三重维度[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85-94.
- [2] Dalls W. Smythe. On the audience commodity and its work[M]. New York: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81.
- [3] 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M].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 [4] 罗森布莱特,亚克利斯.优步:算法重新定义工作[M].郭丹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 [5] 孟飞,程榕.如何理解数字劳动、数字剥削、数字资本?——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J].教学与研究,2021(1):67-80.
- [6] 韩文龙,俞佳琦,唐湘.从组织控制到算法控制——数字劳动中控制方式的转向及其治理[J].中国经济问题,2025(2):29-41.
- [7] 陈龙.“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J].社会学研究,2020(6):113-135,244.
- [8] 范玉仙,王晨.平台经济下的劳动控制与抵抗——以网络文学平台的田野调研为例[J].当代经济研究,2023(6):26-35.
- [9] 朱方明,贾卓强.平台经济的数字劳动内涵与价值运动分析[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2(3):114-121.
- [10] 魏海涛.平台经济背景下的劳动过程理论:挑战与新议程[J].广东社会科学,2024(2):199-210.
-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12] 闫方洁,刘国强.论平台经济时代资本控制的内在逻辑与数字劳工的生存困境[J].河南社会科学,2022(3):43-50.
- [13] 刘怀玉,吕欣忆.数字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批判的哲学方法论探本[J].天津社会科学,2024(1):14-22.
- [14] 韩文龙,李艳春.数字劳动控制的策略、形式与机制:以自媒体平台为例[J].经济纵横,2023(6):20-29.
- [15] 克劳斯·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M].李菁,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 [16] 张特,闫方洁.算法推荐视域下的青年价值观塑造:风险挑战与优化策略[J].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22(5):32-41.
- [17] 万丽萍,向斌,王敏.饭圈内部集体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控制研究[J].未来传播,2023(5):70-78,138.
- [18] 蔡万焕,乔成治.大数据、数字化与控制: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当代财经,2022(6):3-11.
- [19] 徐景一.算法机器与资本控制:劳动过程理论视域下的平台劳资关系与资本积累[J].社会主义研究,2022(3):32-39.
- [20] 李钢.数字资本主义的劳动控制及其解放路径蠡探[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9):134-144,152.
- [21] 刘战伟,李媛媛,刘蒙之.平台化、数字灵工与短视频创意劳动者:一项劳动控制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7):42-58,127.
- [22] 胡磊.平台经济下劳动过程控制权和劳动从属性的演化与制度因应[J].经济纵横,2020(2):36-44.
- [23] 黄再胜.算法控制、“自我剥削”与数字劳动的时空修复——数字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LPT研究[J].教学与研究,2022(11):97-112.
- [24] 陈晓仪,常庆欣.从“血汗工厂”到“技术牢笼”: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变化[J].当代经济研究,2022(4):14-21.
- [25] Antonio Negri, The Politics of Subversion: A Manifesto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9.
- [26] Terranova T, Free labor: Produc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J]. Social Text, 2000(46):33-58.
- [27] 范玉仙,王晨.数字平台下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控制与同意、抵抗与消解——来自某内容平台的田野调研[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1-7.

- [28] 王宝珠,王朝科,王利云. 数字平台空间下的劳动过程分析——一个比较的视角[J]. 教学与研究,2022(7):45-56.
- [29] 伏志强,胡承槐. 数字资本时代平台劳动过程审思——对平台“灵活性”与数字泰勒主义“俱生性”的批判与反思[J]. 浙江学刊,2023(6):170-177.
- [30] Khang H. et al. Self-traits and motivations as antecedents of digital media flow and addiction: The internet, mobile phones, and videogames[J]. London: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3(29):2416-2424.
- [31]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25-07-21)[2025-08-28] <https://www.cnnic.net.cn/n4/2025/0721/c88-11328.html>.
- [32] 杨善奇,刘岩. 智能算法控制下的劳动过程研究[J]. 经济学家,2021(12):31-40.
- [33] Baci A. Medical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digital addiction[J]. Abingdon: Medical anthropology, 2020(22):141-147.
- [34]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35] 杜巧玲,肖峰. 平台资本主义与劳动新异化[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1):12-21.
- [36] Steven Vallas and Juliet B. Schor. What Do Platforms Do? Understanding the Gig Economy[J]. San Mateo: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20(46):273-294.
- [37] 陈琳,邓伯军. 监控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2):190-196.
- [38] 肖恩·塞耶斯. 马克思与异化:关于黑格尔主题的论述[M]. 程瑶,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 [39]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 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M]. 周延云,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 [40] 丹·席勒. 数字化衰退:信息技术与经济危机[M]. 吴畅畅,译.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7.

New Changes in Capitalist Labor Control in the Age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and Their Hacking

Wang Shuting Jia Shupin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In the era of platform economy, digital labor, data monopoly, and algorithmic control jointly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control strategies. In terms of control mechanisms, platform capital implements life control with labor mode of “Prosuming”, psychological control with platform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whole-process control with measurement and monitoring of labor information, and hidden control with transfer of labor control, and they respectively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panding the scope of control, deepening the degree, extending the breadth, and being hidden in the way. With more precise and secretive monitoring, platform capital has plunged laborers into the plight of digital addiction, dissolution of subjectivity, loss of privacy, and false autonomy. It is necessary to reflect on the capitalist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and intelligent algorithms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logic of the new type of capital control and the plight of laborers, reasonably regulating the control of capital over labor in digital labor, and promoting the healthy operation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Keywords: platform economy; labor control; logic of capital; new changes.

[责任编辑:左福生]